

新中国新政协的特邀代表

抗日战争期间，萨镇冰于1938年1月1日任海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足迹遍及四川、贵州、湖南、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地。

1949年7月26日，李宗仁来到福州，代表蒋介石请萨镇冰去台湾。他是参加过甲午海战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萨镇冰予以婉言谢绝。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强调：参加的代表，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有个别特殊情况可以列名而不来的，如年纪过高的萨镇冰先生。

1949年10月5日，92岁的萨镇冰联合在福州共212名前国民党海军人员，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祝贺中国人民政协会议胜利召开，并祝中央人民政府诞生，表示要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努力。同日，萨镇冰致电毛泽东，祝贺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萨镇冰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干部施行供给制，薪俸待遇按粮米折算。政府每月发给萨镇冰的生活费是630斤大米，不久增至2200斤。他每月除留少量家用外，大部分都赠予穷苦戚友及孤儿。

在新中国成立后，萨镇冰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祖国统一大业。临终前不久，萨镇冰写道：“国疆昔小而今大，民治虽分终必联，人类求安原有道，俗情狃旧尚无边，忘怀富贵心常乐，从事勤劳志益坚，所望群公齐努力，相扶世运顺乎天。”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于福州，享年94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来唁电。中央人民政府发给治丧费，福建人民政府举行公祭，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



◎黄禹康

著名历史学家

1979年9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吴晗、袁震夫妇举行的追悼会现场，挂满了吴晗生前好友送的挽联、挽诗、挽词，其中一幅挽诗写道：“《罢官》容易折腰难，忆昔《投枪》梦一般。《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低头四改《朱元璋》，举眼千回未过关。夫妇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

(一)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吴店乡苦竹塘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原名吴春晗。自幼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成了远近闻名的“蛀书虫”。1930年，清华大学因吴晗文史成绩优异，将他破格录取为历史系二年级的插班生。勤奋学习的吴晗受到师长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清华大学还将他的毕业照登在了《清华年刊》上。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早在吴晗毕业前几个月就向清华要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则再三要吴晗去北大任教；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却坚持要吴晗留校，破格聘请他担任了历史系教员（是当时清华大学在助教之上、讲师之下的一级职称），并让他给研究生上明史课。有了教职的吴晗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中，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尤其是在明史



吴晗、袁震1939年在昆明的结婚照片

吴晗的旷世之恋

的研究中独树一帜，很快就被学术界公认为最有前途的明史学家。他似乎决心以史学作伴，对婚姻大事无动于衷。

出人意料的是，一位身患肺病、骨结核病卧床不起的姑娘，竟点燃了吴晗心中熊熊的情爱之火。姑娘名叫袁震，原名袁震之，出生在湖北老河口的一个书香门第。袁震自幼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9岁便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后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汉“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袁震的叔父、婶婶相继被捕牺牲，姐姐袁溥之也被捕入狱。与党失去联系的袁震，在老师张佳敏的帮助下，于1930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先后发表了《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论文，成为清华同学中赫赫有名的才女。1934年春，袁震即将毕业时，却由于学习太刻苦、生活太艰苦而染上了肺病，不得不退学。

退学后的袁震在北平举目无亲，治病需要很多钱，只好靠张仕敏表兄吴之椿接济。后来，吴之椿到青岛工作，便改由吴晗的同学梁方仲照顾袁震。

这天，梁方仲到医院看袁震，身后跟着一个儒雅的年轻人。梁方仲说：“我要去广州一段时间，这是我的挚友吴晗先生，我不

在的时候就由他来照顾你。吴先生已正式被清华聘请留用，蒋主任十分器重他，免了助教这一台阶，直接破格聘请他为教员。”

出乎吴晗意料之外的是，袁震谈起了他早期发表过的几篇论文。吴晗不由得惊异道：“你看过我的那几篇拙作！”袁震侃侃而谈，独到见解令吴晗这个一直潜

心在书斋中做学问的才子耳目一新，不由得击掌称道：“真不愧是一个才女，令我辈汗颜也！”

吴晗对第一次会面的袁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想不到袁震这样一位重病在床的女子，对生活还是那样豁达乐观，尤其是她深厚的学术功底，即使在博学的男子中也少有，心里再也放不下这位病榻上的女才子。从此，吴晗隔三差五就会到位于养蜂夹道的北平肺病医院去看袁震，与她一道讨论学术问题。

由于饮食不足、营养不够，袁震的病情逐渐加重，肺病之外，又得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固定着躺在病床上，完全丧失了自理饮食起居的能力。面对浑身是病、一贫如洗的袁震，吴晗来探望的次数更多了，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每次从医院出来后不仅丝毫没有疲倦之感，反而兴奋不已。既缘于学术遇知己的激动，更是对袁震难舍难分的爱慕之情。

袁震也对吴晗一往情深，可自己得的是重症，她不能也不愿拖累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

吴晗执意要从自己每月80元大洋的薪水里拿出一半接济袁震和袁溥之。袁震不愿接

受，吴晗便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袁溥之帮他抄写《李朝实录》中的史料，40元大洋作为抄稿的报酬，这才得到了袁震的默许。不久，袁震的堂妹袁熙之也来到了北平，吴晗便介绍她到交通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每月有60元大洋的薪水，这才保证了袁震的医药费和二姐妹的生活。

(二)

吴晗恋爱的消息传到义乌老家后，母亲蒋三英听说儿子找的女友居然是一个卧床不起、长他3岁的大龄姑娘，托人写信坚决反对，后来，竟然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跟着同乡来到了北平。

吴晗是个极孝顺的儿子，为了不使母亲痛苦失望，他与人将躺在病床上的袁震抬到了别处，然后安慰母亲说：“袁震的病已好多了，她现在不在北平，刚到外地疗养去了”

1936年春，吴晗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肺病，他的好友、清史学家罗尔纲跑去医院劝他中断与袁震的关系。翻来覆去地讲了半天，吴晗却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罗尔纲生气地责备他的举动伤害了年迈的母亲，为不尊不孝。罗尔纲话音刚落，吴晗闭着的眼睛睁开了，泪水汩汩而出：“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而袁震却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可我不能从母命。”罗尔纲从心里敬佩吴晗的高尚情操，称吴晗“超凡入圣”。

正当吴晗和袁震热恋之时，“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北平的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外迁，吴晗应云南大学之聘赴昆明教书。为了不拖累恋人，袁震坚持要留在北平。

在昆明期间，吴晗除了按月给袁震寄去

生活费外，还每隔几天就要给袁震写一封热情洋溢、情真意切的信。爱情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吴晗执著爱情的鼓舞下，袁震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身体也有了较大的起色，到1939年春，袁震终于可以下地行走了。5月，在袁溥之和袁熙之的护送下，袁震从北平经天津搭船来到了越南海防。吴晗满怀喜悦地从昆明赶到海防，在码头上，吴晗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站立的袁震，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袁震三姐妹到昆明以后，就住在白果巷4号吴晗的家中，而吴晗的母亲和妹妹也已从家乡来到昆明避难。天天盼着儿子结婚的蒋三英，见袁震面色苍白，步履维艰，为了避免与袁震相处得不愉快，只好私下里偷偷地规劝儿子不要感情用事。可吴晗任凭母亲怎么说，就是坚持不依。

袁溥之去了重庆，袁震身边就只有一个在西南联大当速记员的堂妹袁熙之。如果吴晗不照顾她，袁震将很难生活。母亲便对吴晗说只要他不与袁震结婚，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吴晗热泪盈眶地说：“人的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来换取的，否则，岂不成市侩了吗？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十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

蒋三英见儿子真的铁了心，只得勉强答应了。袁震在吴晗的精心护理下，身体恢复得更快了，脸色也红润了起来。1939年10月的一天，吴晗和袁震来到城内一家旅馆，约了几位要好的朋友，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

(三)

多灾多难的袁震婚后没多久，又患上了

子宫肌瘤，出血不止。大量的出血又引起了严重的贫血，不得不每十来天就要输一次血。吴晗得知自己的血型与妻子的血型相匹配，便瞒着学生和好友将自己的血输给妻子。由于输血太多，吴晗一度患上了脑贫血，几次在讲课时晕倒。袁震知道后，十分痛心地说：“你不要再为我输血了，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啦，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垮呀！”吴晗听后却轻松一笑，安慰妻子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为了使你早日康复，我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支付袁震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身上穿的是大学时代的破旧衣衫，脚下是露出后跟的布鞋，每次去给学生上课他都要来回走20公里路。为了给袁震增加营养，吴晗买不起肉时就买些牛骨头来炖汤给袁震喝，他自己每次给袁震输完血后，也不过喝上碗牛骨头汤补补身子。后来到了实在没有钱的时候，吴晗便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好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

受妻子影响，吴晗渐渐地开始注意政治和参加民主运动，1943年7月，经著名法学家周新民和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介绍，吴晗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吴晗更加关心时局，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吴晗和袁震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49年2月，吴晗受党中央之托，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0月1日，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主抓文、教、卫工作。1957年3月，吴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任领导职务的吴晗公务缠身，但他对袁震的感情和照顾仍是一如既往。袁震的病情稍好后，也尽力在学术上充当丈夫的帮手，许多人在吴晗家里都见到过他俩逐字逐句推敲文章时那严肃而又亲密的情景。在妻子的帮助下，吴晗十几年间先后出版了《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等多部著作，每本著作袁震都要帮助查资料、拟提纲、校对文稿，花费了大量心血。吴晗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道：“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吴晗、袁震同甘共苦了10余年，因袁震一直身体不好，一直没生小孩，夫妇二人十分渴望有个孩子，时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的康克清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吴晗夫妇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抱回了一个小女孩，取名吴小彦。小彦长得很机灵，也很懂事，给了吴晗夫妇心理上莫大的安慰，不久，他们又从孤儿院抱养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正当吴晗和袁震沉浸在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中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正向他们袭来。1968年3月，吴晗正式被逮捕入狱。吴晗入狱不到一个月，袁震也被送到“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连女儿小彦、儿子吴彰照顾她的权力也被剥夺了。本来就长期卧病的袁震哪里经得起如此这般的非人折磨，1969年3月18日与世长辞。同年10月11日，饱受折磨的吴晗也含冤辞世。

1979年9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吴晗、袁震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吴晗夫妇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这对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惨死于沉冤未白之时的夫妇再度进入了世人的心间！